

互动与重构：海外温州人民俗观念与行为的传承与变化

——以巴黎的温州人为中心

邱国珍

摘要：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温州人移民海外，把生意做到世界各地。本文拟从民俗学视角审视和解读海外温州人，研究巴黎的“温州现象”，重点探讨如下问题：这些非精英移民是怎样从温州来到巴黎、在巴黎获得立足之地和发展空间、融入法国社会的？作为一个外来群体，他们原有的民俗观念与行事方式在异国他乡有什么改变？这些都是本文拟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巴黎 温州人 民俗文化 互动 重构

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流动性。人口的流动，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敢为天下先的温州人，不仅在中国的首都建立了一个“浙江村”，¹而且还移民海外，把生意做到世界各地，法国巴黎因此成为海外温州人的一个主要聚居地。十万温州人制造了巴黎的“温州现象”。上世纪90年代，这种现象引起了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民俗学家的注意。社会学家率先行动，实地考察巴黎温州人，发现当时许多移民理论对待现实的移民行动缺乏说服力与解释力，为此提出了新的移民理论，即社会建构理论，同时也消除了许多人因为不了解而对移民的误解与偏见。²

从民俗学的视角，审视和解读海外温州人，同样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这些非精英移民是怎样从温州来到巴黎、在巴黎获得立足之地和发展空间、融入法国社会的？作为一个外来群体，他们原有的民俗观念与行事方式在异国他乡有什么改变？温州民俗文化与西方文化遭遇之后，会有怎样的互动、变迁和重构？这些都是本文拟探讨的问题。

一、地缘与家族：巴黎温州人的社会网络

地缘和家族，在民俗学上属于“社会的民俗”。社会的民俗是指世代代传承下来的城乡社区各社会集团结合、交往过程中各种关系间形成的习俗惯制。³

先从地缘说起。如果以更宽泛的视域，地缘，可视为地理环境和地缘关系。从地理环境看，温州是地处浙南的海滨城市，有着“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自然环境。改革开放前交通不便，迟至20世纪90年代才通飞机和火车。温州的地理特征是人口多、土地少，远离政治中心，几乎全部是山区，靠海洋而且内部河流众多。这种地理特征对于创造商人的品格并形成商帮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种人多地少、无法靠土地为生的特点决定温州独特的民俗文化。在人多地少的温州，不是所有人靠种田、捕鱼就能养家糊口。学手艺、闯江湖是更多温州人的生存选择。于是，温州成了闻名遐迩的“百工之乡”；温州人有了闯荡江湖、漂洋过海的谋生方式。费孝通教授说过：“温州原是个穷地方，人多地少，单靠农业连温饱都难以维持。当地农民就大批到外地去打零工，卖手艺，如木匠、裁缝、修鞋、弹棉花等。”⁴温州人所到的“外地”，不仅是国内各地，而且是世界各个角落。历史上，温州侨乡比较集中，永嘉县的七都镇、桥头镇，温州市的丽岙镇、塘下镇，文成县的玉壶镇以及温州市区，都是华侨较多的地方。

因贫穷、求生存，是温州人漂泊海外的主要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在华侨中，也有少数人是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温州人移居国外目的就更加明显。这显然与温州民俗文化有关：浓郁的海洋文化气息，鲜明的商贸文化特色，是温州民俗的两大特征。在这样一个民俗文化圈内，人们更易产生“相对失落感”。“新经济移民理论”主要代表奥迪·斯塔克（Oded Stark）以自己在墨西哥的经验研究表明，同一收入差距对于不同人具有不同意义，因此，引发移民的动因不是两地“绝对收入”的差距，而是基于同参照群体比较后可能产生的“相对失落感”。⁵一般说来，在社会发展相对迟缓时，人们比较容易安于现状。可是，当社会发生急剧变动时，人们习惯于选择与原先条件不如己，但现实处境却优于己的人进行比较，从而产生一种强烈的“相对失落感”。

那么，温州人为什么能满世界闯荡呢？在大对数国家（如法国）对移民严格控制，中国国内也是严格限制出国定居、严厉打击偷渡出国移民这样的背景下，温州人却能源源不断地出国移民？这就需要用地缘关系予以解释。

在历史上，温州人都是在市场信息很不畅通和发达的情况下向外流动和迁移，也不是通过政府有组织地进行的。主要凭借他们的人际关系链，并且不断地将这一链条加以延伸，在国内形成了一个信息传递、人员动员和援助的网络。而地缘与家族，就是织就此网络的经线和纬线。

地缘，除了上述的温州地理环境之外，还可作为民俗学学理上的“地缘关系”予以解读。所谓地缘关系，是指共同居住的乡土联系起来的各种社会关系，俗称的“同乡”、“乡亲”都属于这种关系，俗话说说的“人不亲土亲”，也是这种地缘关系的形象反映。

家族，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家族的内外职能，使得家族内部成员、家族与家族之间，即家族与整个社会产生了物质生活的相依性，同时也必然产生了精神生活的相依性。关于社会的民俗研究，首先要着眼于家族的民俗，它往往是社会习俗的发源基地或传承单位。

温州诸多的古村落，聚族而居，是典型的血缘村落。家庭和家族，自然就成为社会网络的核心。围绕这一核心，地缘和业缘共同建构了温州人的社会网络。在历史上，温州地区的商业就相当发达，温州人凭借着濒海优势，早在唐代与海外就有密切的商业贸易往来。发达的商业不仅使温州人养成了浓厚的经商意识和观念，而且使温州形成了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结构。具体地说，温州人外出务工经商，一旦发现某个地方有钱可赚，就写信或派人回家，把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带出来；或者是某人赚了一些钱寄回家，让周围的人知道了，从而引来一批熟人。以温州人进入法国为例，他们主要采取三种方式：家庭团聚、劳工输入和偷渡。这三种方式都是依靠他们的社会网络发挥作用的。在这个集聚过程中，社会网络既是他们传递流动信息的媒介，又是他们流动得以进行的机制。如张成先先生，1979年以探亲的名义到了法国，1981年碰上了密特朗总统颁布的特赦令，很快拿到了居留证，后来又加入了法籍，开店、办工厂。有了自己的事业，更有了帮人到法国的资本，经他带到法国的人不下100多。经他家族一条线带出的族人，竟有三四百人。⁶

相信由族亲、朋友和乡邻合成的社会关系的力量，是温州人深入骨髓的民俗观念与行事方式。因此，基于地缘与家族的温州人的社会网络，不仅使温州人鱼贯进入法国，而且使他们在到达巴黎之后就有工作，有住处。总之，这种特殊的社会网络，是海外温州人赖以生存的民俗资源。他们的流动和迁移、非法存在、就业、融资及情感沟通，都离不开这张网络，离不开这一资源。正是这样的社会网络，使得越来越多的温州人来到法国，在这样的流动过程中，社会网络越织越大，覆盖面越来越广，反过来，推动着流动的不断延伸和继续。

二、行业与侨会：巴黎温州人的自我提升过程

温州人闯荡世界，移民巴黎，说到底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为了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为此，他们含辛茹苦，甚至忍辱负重，把温州民俗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发挥到极致。尤其是偷渡者，从做黑工到做老板，有的甚至做到侨领，其奋斗过程，是一个不断提升自己的过程，也是展示温州区域文化尤其是民俗文化的过程。

如前所述，温州人到了巴黎后要做黑工。黑工是就其工作性质而言，做什么工作则是行业的范畴。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温州人初到巴黎，他们不可能有选择性的“入行”工作。干嘛一行，怎么干，是先到巴黎的族亲或朋友为其安排好了的。

民俗学视野中的行业，是历史的产物，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陆续出现的各种民间自发的劳动分工集团。行业的产生，一方面是有了一定民族、地区的生产环境、生产水平、物资基础和人们生活的需要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与这些地区人们古老的文化传统、心理素质乃至原始信仰的影响有关。行业的传承和演变，带有经济民俗深深的烙印和民俗文化的鲜明特色。

做手艺活、外出经商，是世代温州人的谋生手段。巴黎的温州人也不例外。巴黎温州人群体从事的都是法国最边缘的行业，即所谓的“三把刀”：皮刀（皮革业）、剪刀（服装业）和菜刀（餐饮业）。就大多数温州人来说，他们在就业上一般都要经历黑工、合法做工和当老板的过程。我们看一段巴黎温州人入行从业的材料：

20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初，是早期温州人去法国较为集中的时期，那些人基本上是偷渡者，没有合法身份，只能做些小商小贩生意。当时他们不能（也没有资格）开餐馆、办工场和商店，只能过着艰苦的流浪生活。贫困华侨聚集之地，使法国人避之若蛇蝎，结果这里成了法国的“唐人街”。巴黎温州人的经济活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出现新的转变和发展，他们在巴黎市里昂火车站周围形成了第一个华人社团。后来，有更多人融入法国，同法国女子结婚成家，谋生的途径也发生变化，从经营中餐馆扩大到其他行业。

在战争期间，一些温州人积攒了一些钱，为他们在战后开创自己的事业，作了资本积累的准备。但是，巴黎温州人的经济真正具有一定的整体规模，还是在七十年代末以后形成的。七八十年代，从温州来了一批年轻人，给温州人队伍输入了一股新的活力。这批人比老一代有文化，他们一到巴黎，就开始新的创业。他们首先不喜欢里昂火车站那个破烂的唐人街，而纷纷移居到巴黎三区与四区交界的庙街，这个地方是犹太人的地盘，沿街都是犹太人开办的皮包店、皮衣店和皮革加工场。就是在这样充满竞争的地段，年轻的温州人开始了与犹太人竞争的历程：他们试着生产和加工一些皮带、皮包，虽然加工粗糙，但价格低，很快就赢得了一些顾客的青睐。当然他们又不断地改进加工工艺，再加上他们全力以赴地投入劳动，犹太人一天工作8小时，而温州人（包括老板和雇工）一天则工作13小时以上，大大降低皮带、皮包的价格，渐渐地占领了中低档的皮包、皮带市场。

八十年代中后期，庙街就演变为温州街了。温州人在包办了那里的皮带皮包生意后，也开始多种经营，如开办餐馆、首饰店、钟表店等。这街区的一间间旧店铺，经过他们改头换面装修成了新的商店，有销售皮包皮箱皮带的，有销售围巾领带头花的，有销售珠宝首饰的。也有的成了销售中国货的超级市场，还有的成了中餐馆、钟表店、眼镜店、理发店、美容院、旅行社和影视公司。掌店虽然是温州人，但都能讲流利的法语。法国人称这里为温州商业街。从九十年代开始，温州人把经济活动向巴黎的东北角延伸，在巴黎的美丽城大街开辟了一个新的温州人经济活动区。那里

原来是阿拉伯移民的聚集区，属于巴黎有名的落后贫穷地区，社会秩序相当混乱。但是，经过温州人的不断开拓，现已发展成一个相当繁华的商业区了。九十年代温州人在巴黎的伏尔泰街一带又发展成一个专门的服装批发零售市场。那里原来是犹太人经营服装的场所，温州人利用犹太人已经创造的市场效应，就在犹太人经营的店铺旁边摆下阵营，销售自家生产的服装或者代销其他温州人生产的服装。由于他们销售的服装价格便宜，赢得了来自中欧与东欧商人的青睐，于是生意越做越火，引来更多的温州人进入那里。七十年代以前，很少有一个温州人一年能赚10万法郎，而现在一年赚百万法郎的已不在少数了。与老一代温州移民相比，新一代移民不论在经营规模上还是行业领域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⁷

透过艰苦创业的巴黎温州人，我们依稀看到当年温州夜织“鸡鸣布”妇女和走四方“弹棉郎”的身影。《隋书·地理志》载：“永嘉县，妇人勤于纺织，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谓之‘鸡鸣布’。”清陆进《东瓯掌录》中记载得更加具体形象：东瓯一带，“妇女勤纺织，寒暑昼夜之间，虽高门巨室，始龀之女，垂白之姬皆然”。她们夏织苎，冬纺棉，昼夜之间，不仅自己织布作衣，还为人家织布，拿到市场上出售。

温州人素有从事手工业和外出打工开铺的传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生产民俗是弹棉。温州有首民歌是这样唱的：“弹棉郎，弹棉郎，身背弹弓走四方。”这种勤劳耐苦的精神，同样也反映在今天巴黎的温州人身上。

温州人的勤劳耐苦精神，在民间歌谣中多有反映。如一首瑞安山歌：“山歌不唱走调多，坐立不正背成驼。田不勤锄草生窝，身不劳动骨头酥。”在歌颂勤劳的同时，温州民歌对好逸恶劳者作了辛辣的讽刺。如温州童谣《懒汉歌》：“天光（早晨）露水白洋洋，宁可日昼（中午）晒太阳；日昼太阳上晒落，宁可黄昏夹暗摸；黄昏蚊虫叫嗡嗡，宁可明朝天光起五更。”这些民间歌谣和上述“鸡鸣布”、“弹棉郎”习俗所代表的吃苦耐劳传统，是完全一致的。它们不仅世代相传，还随着巴黎温州人的脚步，传播到海外。

巴黎的温州人无论是做黑工，还是合法做工，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当老板。惟有

如此，他们才可能融入法国社会，才能衣锦还乡，受人尊重，实现自我价值。这是在巴黎的大多数温州人最大的事业追求和梦想。为了让梦想早日变为现实，他们首先要获得合法身份。1995年，他们成立了旨在获得身份合法化的“第三团体”，以后又组建“第四团体”、“第五团体”、“第六团体”、“2000团体”等。通过团体合作式行动，帮助成员整理有关“纸张”（证明材料），向他们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组织成员召开大会商量对策和上街游行，甚至还占领教堂，开展绝食，与法国政府有关部门展开谈判，使政府在许多方面做出让步和妥协从而加快了合法化行动。⁸

巴黎的温州人所采取的团体合作式行动，有其历史渊源。在温州，民间自发的“抱团”组织很多，小到义结金兰式的“盟兄弟”、“盟姐妹”，大到各种民间组织，如行会、协会、商帮、行会和商会。这些同业组织名称各异，功能大体相同，都属于民间职业集团组织。除了经济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之外，中国民间的同业组织还具有西欧行会所不具备的某些功能。例如许多行会都十分重视联络乡谊，救济同业，办理善举，尤其是外地工商业者和商人建立的会馆、公所，更是将其作为重要职责。因为外乡人在他乡异地无论是经商还是经营手工业，往往会遭遇更多的困难，需要相顾相恤。传统的中国又是一个非常重视乡土人情的国度，外出经商者常常按地域籍贯形成商帮，遇事即互帮互助，同业组织作为工商业者的组织也自然而然地承担了这方面的职责。

如果说巴黎的温州人成立各种团体是为了早日获得合法化身份，那么，有了合法身份、并且堂堂正正当了老板的人，还有什么更高的追求呢？在巴黎的温州人当中，衡量他们社会地位的指标主要有三个：一个是来法国的时间，一个是当老板，一个就是在侨会中的地位。换言之，在巴黎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获得合法居留证，也就越有可能当上老板，也就越有时间和热心从事社会活动。当地温州人一般都认为：参加侨会是温州人在巴黎的一项最重要的社会活动，也是最能体现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如果一个人是老版兼侨领，那就被视为最成功、最有影响的人。

参加侨会，并在其中担任职务，是有代价的，一个基本条件是要缴纳一定的会费。会费分五等，会费的多少将决定一个人在侨会中担任什么样的职务。某侨会规定，要当会长，至少一年要缴纳10万法郎会费。当然，参加侨会并任侨领，不仅事关荣誉，还有许多实惠，其中最重要的功能是建立和加强与中国各级党政组织和管

理部门的联系。回国有领导接见，在国内投资有很多优惠，等等。总之，侨会虽然只是一种民间组织，各个位置之间也没有行政科层制中那种严格的等级关系，但依然有行政化的印记。

马斯洛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中国民间，也有“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的说法。温州区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温州人特别爱“面子”，场面上的事，都要拼死一搏。在温州，如果结婚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隆重的婚宴婚礼，那是很没面子的；如果送人情“不够意思”，也要让别人说闲话的，这个城市太小了，街坊邻居都认识。“面子”，往好里说是马斯洛理论中的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但过度讲“面子”，实则是人们的虚荣心在作祟。不可否认的是，温州民俗文化中，有一些负面的东西，过分讲面子、讲排场就是其中之一。在商界，温州人“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观念很普遍，商海浮沉，怎么都要做个小老板。同样，巴黎的温州人也就难免会有衣锦还乡、光宗耀祖这一类“面子”观念。民俗文化是一张网，生活在其中的芸芸众生，一般是难逃其束缚的。只是，时代变了，国度变了，就要有挣脱这张网的意识和能力，否则就难以在公民社会中有所作为。对此，人们或许未必都有清醒的意识，但现实社会会给人以教育和启迪。事实上，巴黎的温州人在这方面已经有所警醒并有所行动。

三、互动与重构：巴黎温州人的民俗观念与行事方式的变化

巴黎的温州人是一群特殊的人。从同化理论来看，他们基本上还是属于没有被同化的华人。他们聚众而居，说温州话，吃中国饭菜，以自己独特的经营方式从事经营活动，与外部社会只有经济上的交往而缺乏社会和文化的交流等等。王春光从社会学的角度，认为他们已经“建构一个新的社会类群，或叫社会新类”。⁹

但从民俗学视角看，他们作为中国俗民，在法国巴黎经历了“再习俗化”的过程。在移民的过程中，他们在逐渐改变自己，温州民俗文化和法兰西文化发生互动，在他们身上都留下了印记。他们是温州人，但已不是原来的温州人（事实上，巴黎的温州人身份不一，有的已经入了法国籍）。他们的民俗观念与行事方式，已经或正

在悄然发生变化。

如前所述，温州民俗作为文化基因，已进入该文化圈内每个人的血液之中，影响到他们的民俗观念与行事方式。巴黎的温州人也不例外。他们在温州习得一技之长，在故乡培养了勤劳耐苦精神。他们之所以不辞辛劳，来到并立足于巴黎，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文化的力量，是民俗的力量。但这显然不够，“再习俗化”是他们面临的新的课题，“再习俗化”的过程是他们文化重构的过程。

与老一辈的巴黎温州人不同，20世纪70年代以后来巴黎的温州人，他们除了赚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移居那里。与没有移居目的的移民相比，他们带有更为明显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差异：他们会有强烈的愿望去了解当地社会，在与当地社会的互动（包括直接的人际交往和间接的传媒接触）过程中，会根据当地的习俗、规则，相应地对自己的观念和行为进行重构。

民俗文化的互动与重构，必然带来民俗观念与行事方式的改变。下面从人际关系、生活方式、融资方式、捐资意向等方面，对海外温州人的民俗观念与行事方式的改变做一解读。

人际关系。地缘与家族，使温州容易成为“熟人社会”。因此，“聚群”、“抱团”是温州人的一个特色。按市场的技术等级来衡量，温州人处于很低的等级，有不少人是文盲、半文盲，但是他们却能闯出一片天地来，这是温州人令人赞叹、令人信服的地方。那么温州人靠的是什么呢？学界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如温州人能吃苦耐劳、精明、胆子大等等，这些话都有其局部的合理性，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温州的团聚特点以及互助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温州人之所以闯天下，凭借的就是他们能充分地调用其拥有的社会关系资源，并将其变成他们的社会资本。温州人使用的社会资本大多局限于民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尽管在外出经商过程中不断地寻找与政治官僚有关的社会关系，但是民间社会关系网络是他们的立身之本。

但是，以上表述只适合国内的或刚到巴黎的温州人。在巴黎待的时间越长，温州人的人际关系变化就越明显。以亲戚朋友关系为例。前面说过，温州人进入巴黎，尤其是偷渡者，多是靠亲戚朋友帮助，亲戚朋友还为他们提供了打黑工的机会和安全保护。这是一种社会网络，但社会网络会随着时空变化而变化的。与在温州时所拥有的社会网络相比，外出流动的温州人在社会网络上有四种变化：一是亲戚关系

范围有所拓展，原本较为疏远的亲戚关系（如超过五服的远亲关系）在异国他乡得到重新认可和建立；二是社会网络的思域覆盖面得到极大的拓宽；三是城乡关系对社会网络的影响比在温州有所消弱；四是共同的经历（如一起偷渡共过患难）在构建社会网络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总之，身在异域的温州人，会对社会网络进行更新和修订。如在国内，亲戚到家里住一段时间，一般不会被要求付房租费，但是在巴黎就不同：让亲戚住在家里，已经是对亲戚的很大帮助，然而亲戚必须付房租费，这叫“搭铺”。在我国传统的民俗文化中，亲戚间的相互帮助天经地义，一方提出要求，另一方几乎是有求必应。但是到了国外，温州人的生存条件发生了变化，同时西方文化中讲究权利与义务对等的思想观念对那些移民时间较长的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亲戚间的关系也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不能简单的归为“到了国外人情突然变得淡薄”，而是温州人为适应在异国他乡的生存、发展和融合的需要而出现的。

生活方式。在巴黎的温州人不少已经接受了法国人的生活方式，这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很明显，如他们习惯于去咖啡馆喝咖啡谈天。有许多温州人，刚来时并不喜欢喝咖啡，到了巴黎后即便是40来岁的人也同样觉得不喝咖啡简直受不了。又如说话的声音。温州人到了巴黎看到外国人说话轻声轻语的，现在也一改在老家时大声喧哗的习惯。

生活方式的变化，更多体现在家庭内部。如家庭成员的开支，开始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即除了共同的消费开支外，个人偏向于自己的独立开支，丈夫有自己的收入和支出，妻子也有自己的小金库和支出。这是西方社会的个体主义生活观念对温州人民俗观念与行事方式的影响。在法国，温州女性的能力似乎显得更强，机会似乎更多。这与女性的适应能力、学习语言的能力比男性要强有关，也与法国这个强调绅士风度的社会有关，因此，女性外出做生意比男性更容易取得成功。在婚姻上，女人越来越倾向于自主选择，妻子主动提出离婚的比例在增大。

过年过节。在中国诸多的节日中，海外华人最为重视的是春节和中秋节。春节俗称过年，在中国民间，过年是一个时间段，即自腊月二十三祭灶以后至正月十五元宵节近一个月的时间。但在海外华人那里，所谓过年，一般只在除夕那天做一顿中餐，烧几个菜；除夕之夜聚在一起包饺子，在正月初一的子时吃。一般来说，南

方人重大年夜的团圆饭（温州人称为“分岁酒”），北方人重饺子。但为了方便，更为了热闹，现在很多南方人也聚在一起包饺子过年，所以饺子成了海外华人过年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元素”。但巴黎的温州人，一般还是要吃分岁酒的。

在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方面，巴黎的温州人也有许多新的观念和行为习惯。结婚是人生的大事，他们对此非常重视，虽然没有国内的相亲、合婚、订婚那一套繁文缛节，但婚礼却丝毫不马虎。他们往往举行隆重的仪式。有的人开着豪华轿车，到巴黎的主要名胜游一圈，并请专业摄像师摄像。一些信仰天主教或基督教的温州人，会到教堂里举行庄严的结婚仪式。巴黎的温州人，尤其是老年人，对自己将来的归属也有观念上的变化。过去，他们是要“叶落归根”的；现在，已有相当多的人转变了观念，改为“落地生根”。在葬礼上也是中西合璧。他们非常看重死亡，在为死者举行隆重的葬礼时，请来和尚为死者的亡灵念经拜佛，一方面希望死者在阴间享受荣华富贵，另一方面也希望死者能保佑活着的亲人。在下放棺木的同时，死者的至亲纷纷向棺木投撒鲜花，以表示他们对死者的哀悼。这与国内葬礼上投撒和焚烧纸钱的习俗迥然不同。投撒鲜花的仪式，是法国人的做法，现在巴黎的温州人也学会了这种做法。

融资方式。这一点，同是温州人，可是到巴黎之后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譬如温州的“呈会”叫“干会”，这是温州民间流行的金融借贷活动，有利息，甚至是属于高利贷。而在巴黎的温州人中间，也有类似“呈会”，但不是“干会”，是“活会”，与温州民间的“干会”相似但又不一样，虽有利息，却不是高利贷，有人情味，但又符合市场规则。这可能与法国的法治社会发育成熟有关，而温州人在此找到了衔接点。

这种变化了的融资方式，在美国的温州人那里也一样盛行，不过那里沿用温州七都镇的叫法，称之为“标会”。《华人世界》有过如下描述：

在美国一个普通的公寓里，老老少少挤了一堂，从他们的口音和衣着打扮上看来，应该是中国人，更精确点就是温州人，这个是他们每个月的聚会，除了联系感情，更重要的是……

“350元！”有人出价了。

380元！”旁边的人看了出价人一眼，嘴里嘀咕了一句：让给我吧！

“500元！”一直座在角落里的一个年轻人志在必得，他等着这一笔钱把在温州老家的妻子办过来。

成交！

据永嘉县七都镇老涂村瞿主任介绍，他的女儿要去美国，家里实在也拿不出那么多钱了，才有国外的亲戚介绍进了“标会”。他的女儿每月需要交付的会钱是350美金，因为其中一期由她标得35000美金，那么加上所需要支付的利息，她以后每个月就要交500美金，直到付清所有的欠款。¹⁰

源于温州民间、又吸收了西方金融的一些规则的融资方式，不仅为温州人出国解决了资金短缺问题，更为海外温州人经商融资提供了方便，使他们赢得了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四、结 语

在巴黎的温州人，多数教育水平不高，语言不通，资本不多。开始时，他们的生活状况极其艰苦，许多人每天工作达16个小时，可是经过苦斗之后，很快成了大大小小的老板。这已经是一个传奇，然而事情并不到此结束。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仅仅把巴黎甚至法国作为他们惟一的生活归属，而是渐渐地在整个欧共体内部（特别是申根11个协议国内部）寻找他们的生活归属，他们拿到了不同国家的居留身份证，有的人既有法国的居留证，又有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家的居留证，他们会根据生活的需要、条件的变化和生意的要求而随时更改自己的生活居留国：有的人在法国居住和生活，而到其他国家做生意，比如在葡萄牙或西班牙开店、办工厂，突然有一天，他们也会到其他国家定居和生活。总之，他们的生活归属发生了跨国界的变迁和移动，在这样的变迁和移动过程中，他们也许把自己建构成为带有跨国公民性质的一个社会新类，一个趋向于不受地区、民族、国家和领土来界定的一类社会人群。

科学研究的魅力，不仅在于方法的新，也在于研究对象的新。海外温州人，尤

其是巴黎的温州人，是一个全新的社会人群，不同于我们以往研究过的任何一个社会人群。他们跨国界、跨文化，他们的民俗观念与行事方式还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对民俗学研究者构成了极大的诱惑和挑战。研究他们，无疑是一个时代的新命题。这个人群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价值，有待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以空前的热情予以研究和发掘。

1 所谓“浙江村”，是指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以浙江温州人为主的外地人，陆续来到丰台区南苑乡大红门地区，租住当地居民房屋，以服装生产和销售为主导产业，从而形成较固定的活动区域。社会学家王春光、项飏都在浙江村进行过社会学调查，分别完成了学术著作《社会流动和社会重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2 王春光：《巴黎的温州人——一个移民群体的跨社会建构行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3 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4页。

4 费孝通：《从实求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02页。

5 王明欢：《20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6 8 9 王春光：《巴黎的温州人——一个移民群体的跨社会建构行动》，江西人民出版社，第59、63、68、69、233页。

7 王春光：《巴黎的温州人》，《文汇报》2001年5月21日。

10 金子：《温州七都镇：海外华人“标会”的始源地》，《华人世界》2005年5月10日。

(邱国珍：温州大学社会学民俗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浙江温州 325035)